

CHRONICLE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1978-2018)

深圳 经济特区年谱

(1978-2018)

【上册】



主 编 陶一桃

副主编 王保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深圳 经济特区年谱

(1978~2018)

【上册】

CHRONICLE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1978-2018)

主 编 陶一桃

副主编 王保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完善这部几经再版的《年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脚步就已经悄然到来。我们是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时代的责任感，对前辈的敬仰和几乎与生俱来的学术情怀与学者的使命感，来完成《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第四版第三次修订稿的。可以说几乎每一次修订，都是一次历史的锻造与灵魂的洗礼。跟随着一座城市的脚步，我们踏着时代的旋律，震撼于改革的力量，感叹着发展的魅力，感受着奇迹的辉煌，分享着富强的荣耀。一座城市的年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程，更看到了探寻中国道路的动人故事与历史篇章。

《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第一版，是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钟声面世的。十年的时间里，《年谱》先后经历过两次修订，本次修订是第三次修订。《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第一版记录的是1978~2007年19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第二版（第一次修订）记录的是1978~2010年32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第三版（第二次修订）记录的是1978~2015年37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第四版（第三次修订）记录的是1978年3月至2018年3月40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本次修订我们除了增加了三年的历史资料外，还对以往《年谱》的内容进行了再次筛选，保留了更具代表性和时代意义的内容，避免了流水账式的简单。同时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规范了事件的排序，尤其对于同一天内发生的若干事件，我们按照具体事件意义的轻重及影响力，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而不是简单的时间序列进行排列。这样既客观记录了深圳的昨天，又充分体现、反映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之都的深圳在中国制度变迁进程中的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功能。

作为中国经济特区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深圳经济特区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自身的改革开放实践，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并不断创造出足以影响亿万人观念的崭新的思想与理念。从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和中国道路的实践来看，经济特

区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概念，深圳作为一座率先改革开放起而崛起的城市，无疑应该写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之中。

时至今日，当人们谈到中国经济特区时，几乎就是指深圳。经历 40 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在相当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一个辉煌的象征。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深圳历史性地承担着改革、探索、示范的使命；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坚定地承担着摸索、试错、寻找路径的使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又几乎与生俱来地承担着先行先试、敢闯冒险，创造、产生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的使命。所以不仅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许多惊天动地的做法与经验是从深圳产生并推广至全国的，而且许多改革与深化改革的实践也是由深圳率先去“干了再说”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和可效仿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深圳经济特区特有的功能与使命。在中国社会迈向深化改革新时代的今天，在率先实现“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进程中，深圳作为最成功、最典型的经济特区，作为拥有自贸区和湾区双重身份与地位的经济特区，依然处于至关重要的率先制度创新的显著地位。

尽管 40 年后的今天，深圳特区并不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唯一地区，但率先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历和身处对外开放窗口的区位优势，使今天的深圳依然具有对外开放最便捷的“窗口”地位。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以示范效应在全国确立市场经济体系是深圳经济特区重要的功能与作用，那么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以不断的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化，则成为深圳经济特区重要的历史担当。经济特区这种内在功能的演变，正是中国社会从以突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以收获潜在利益为动机的诱致性变迁演变的标志。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改革的时代走向发展的时代，以改革谋发展依然是中国社会保持前行动力的内在动因。但改革还没有真正完成，道路依然曲折漫长，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其使命仍在继续，其担当任重而道远。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最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她不仅拥有 40 年改革开放的物质财富积累，还拥有 40 年改革创新的精神财富积累，更有在向国际惯例学习的过程中良好的社会规制和法律环境的积淀，这一切无疑都将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得天独厚的物质与政治资本。当然，经济特区要完成新时期的新的历史使命，还需要继续具备、保持某些特殊的品质，如坚持改革的勇气、深化改革的魄力、实现改革的智慧、实施改革的艺术等等。毫无疑问，最重要的还是拥有承担改革风险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气。

尽管深圳几乎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代名词，但是它并不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全部。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新的特区，尤其是作为经验特区的拓展形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湾区的建立与形成，不仅证明了选择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并进而确立、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正确的，而且说明经济特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有效路径，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因此，我们既要把经济特区作为一座城市或一个行政区域的增长极来研究，也应该把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研究；我们既要研究经济区的特殊性，又要研究经济特区的一般性。我们只有既走进特区，又超越某一具体的特区来研究特区，才能真正理解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 30 周年讲话中强调：“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经济特区还要办下去。

一个民族能够向后看多远，就能够向前走多远。

陶一桃

2018 年 5 月 4 日于深圳·荔园

卷起千堆雪

——“丛书”总序

苏东斌

这一套“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是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组为了学科建设而创作的学术专著。它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博士研究生的文化视野。

陶一桃教授主编的这本书原是丛书的第四部，现应读者要求又修订再版。

（一）

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大业来讲，编写这套丛书的根本目的更在于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在如何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它在引证中强调了以下两点。

其一，早在 1874 年，清末有识之士，曾经担任清廷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于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而另一位有识之士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引证了新加坡、英占香港开辟商埠后经济繁荣的事实后，发表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植，而植益胜；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薛福成在这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鸣锣，要求让商人从“四民之殿”的地位上升到“握四民之纲”的地位，这确实是“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的新道理。

他更深刻地论述：“今之议者，或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或以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余以为皆所见之不广也。”他说，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经验，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既然欧洲在历史上接受过东方文明的影响，“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讳疾忌医和因噎废食都是不对的。他说：只要中国人善于学习、敢于竞争，“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而惊、赅然而企也？”^①

其二，1965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中更加精辟地分析了科学技术与制度因素的深层关系。他指出：外国文明的输入很容易破坏本土社会、文化和精神的统一。在德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艺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对付这种破坏的公式。

但是，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受倡导的文明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很难只采用它的科学文明技术。如果要采用西方先进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修建配合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进一步地为了使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必须让构成它基础的经济活动能够得到顺利进展。

过去的儒教伦理将追求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产生了矛盾，因此，想要拥有军舰就必须影响到该国的文化。

然而，就算业已输入西方国家的科学文明技术，要吸纳其政治观点、思想方法等形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些所谓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地创造它，那么，努力改革的东西就不能够成为人们一种真实的道德基础。

因此，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外国文明的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是深刻且令人进退维谷的。

在那个时代有个学者曾经说：“孔孟的道德已经衰落了，西方的理论还未进入，这就像太阳已经落山，而月亮犹未升起时的情况。”

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军队在日本国土上连续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时候。

日本人不仅要关心每天的生活，还要努力思考日本今后的发展。占领军们开始指示日本政府必须要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革，这样的变化不知道是福是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驻军日本的军队，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美军不仅占据着胜利者的地位，而且还以改革者的身份推进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革。

^① 钟叔河：《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162~163页。

美国将二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对日本进行改革，瓦解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社会结构，削弱日本的军事能力，才能构建世界和平。抱着这样的目的，他们在进驻日本之前就制定了详细的措施，当军队进驻日本后，就开始按照计划在日本推进军事化和民主化。

美国的军队在1945年8月末驻军日本后，就开始实施了以下的措施。在非军事化方面，首先在9月11日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数名主要战犯，接下来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了日本的军事机构，一些国家主义的团体也被解散（1946年1月）；在民主化方面，进一步整肃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公职人员，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也被废除了（1945年10月），赋予妇女参政权（1945年12月），组织工会（1945年12月），等等。

在战后一两年之内美国军队又采取了土地改革、教育改革、解散财阀和制定宪法等措施。这些巨大的变化简直可以称为“不流血的革命”^①。

这两段话所表达的是，制度是何等重要！

（二）

但是，制度经济学一再提醒人们：不仅制度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制度执行更要依赖于人来完成。而作为经济人，又都是在追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以，任何意义上的人性假定，都离不开具体人的具体行为。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浸透着儒家礼仪和缺乏公民意识的国度里，在一个长期“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国家，用王亚南先生的话说，这种情况“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②。“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两者是相提并论的。遵循这样的传统，国人对家庭的忠诚很自然地就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③“皇权主义最深厚的根基，正是这种家长制。”^④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一旦放弃了对人权的尊重和对产权的保护，大众也就自己丧失了自主意识。于是从上层的人治社会到下层的无法无天，便使制度因素更加虚拟化了。

① [日]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1页。

③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22页。

④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

于是，我们评价历史，也就不能仅仅依据个人的主观动机，甚至也不能仅仅依据他的动机所实现的程度，而只能依据大众的基本实践结果。对于所谓的“好人好事”是如此，对于所谓的“坏人坏事”亦是如此。

正如苏联的改革，对政治人物来讲，是失败了。因为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几乎丧失了一切特权（无论别人如何分析，也无论戈尔巴乔夫本人如何解释，这一后果绝不是他本人所希望呈现的）；而对政治事件来讲，却有另外的结果。因为它开启了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从一元帝国向多元联合的全面转型的新时代。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自由——来判断，“无论如何，俄罗斯人民要比在苏联时代获得的自由要多得多”^①。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执政8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这样判断：“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②

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常说：作品的主题远远大于作家的思想。于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人和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答案便一目了然了，那就是，制度绝对是人制造的，而人又绝对不能随心所欲。

当我们赞同任何动物、生物乃至物品的本质都是预先被设计好了的，而人却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的时候；当我们确信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放弃了选择，也就是放弃了自由的时候；当我们承认“上帝死了”的时候，自己才有了称得上“人”的尊严感。可以说，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萨特，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三）

涉及本书的具体内容，我作如下概述。

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走过了30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时，我拟从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期归纳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1. 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要了解中国经济特区创办的大背景，先看两个事实：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

^① 资料转引自《普京：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北京日报》2008年1月21日。

^② 资料转引自《普京：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北京日报》2008年1月21日。

记的吴南生心痛地说：“解放初期，我的家乡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眼前的汕头却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时候还穷啊。”“广东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但人家比我们搞得好，这是个压力。”^①

面对“文革”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邓小平则多次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并高度警觉地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②

1979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直言：“广东要是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并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③

邓小平十分赞同关于广东的这个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未确定时，就对请求中央下拨一点“三通一平”基建款的习仲勋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你不是当过秘书长吗？中央没有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④也正在此时，他在酝酿着一个大决策：“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⑤

可以说从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出台，到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做出决定，中国经济特区也就正式诞生了。对此，邓小平曾明确地指出：“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⑥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可以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第一，苏联模式不行了，计划经济走不通。邓小平说“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⑦。第二，平均主义不行了，均衡发展走不通。据于光远回忆，早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观点：“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在这里，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⑧第三，寻找突破口，创办经济特区。以便在现有僵化

①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213页、第93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80、381页。

③ 《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242页。

④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217页、第221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64页。

⑥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5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0~371页。

⑧ 参见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第155页。

的体制之外能够实行强制性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就走上了一條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模式的特殊道路。

2.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因素

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成就当然举世瞩目，但对于成功的因素，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主要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对此，必须做具体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三大决定性因素。

第一，有一把“尚方宝剑”。

我们之所以把这30年称为“改革”而不是“革命”，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而是自上而下的“授权”。1980年谷牧代表中央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讲：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搞特区的地方，你要亲自抓。^①198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讲：特区有“改革权”——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紧急问题可以在向省委报告的同时，直接向中央请示^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也讲：“你们要闯出一条新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③总之，中央授予的“改革权”就是一把“尚方宝剑”，与此相适应的才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第二，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好地方”^④。

深圳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水域辽阔。试想，如果深圳所面对的不是香港，改革初期怎么会吸引那么多外资？！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和深水码头，盐田港会高居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口的地位？！不仅如此，我分析是便于借鉴市场经济体制的地区（毗邻港澳台）。同时，对于全国来说，它们毕竟是块小地方，当时的中央认为，万一搞错了，对大局影响不会太大。

第三，有一批敢于“大闹天宫”的闯将。

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环境，事情也总是由人干出来，而人又是具有丰富的个体特性、千差万别的。对于特区，从“敢于大胆地使用中央授权，敢于真正先走一

①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8页。

②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343页。

③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2页。

④ 《叶剑英语》，参见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9页。

步”的任仲夷^①，到“我愿到家乡去搞实验，要杀头先杀我”的吴南生^②，从“没有钱就是当掉我裤子也要办一所深圳大学”的梁湘^③，到恳请不做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果断地留在蛇口搞改革开放大实验并声言“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去”的袁庚^④。就是这样一大批既敢于冒险，又敢于承担的改革家们，在特区进行着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创造性地运用着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正是这“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才使特区终于在体制外发生了渐进式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3. 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贡献

从历史的深度来观察，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概括地说，做出了四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贡献了一个“新体制”。

中国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判断：“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⑤ 特区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就是探索到一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变迁这一基础性保障。

第二，贡献了一条“新道路”。

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跃为人口近13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珠海也由一个“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的落后小渔村”变成联合国授予的宜居城市。邓小平在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渔民村时就赞许式地预言：全国农村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⑥ 特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就是寻找到一条从一般小城镇走向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道路。通过非均衡发展能够比较迅速地实现从普遍贫困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

第三，贡献了一种“新精神”。

邓小平多次总结“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⑦。他号召：“第一要大胆去干，第二发现干得不对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总结经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⑧ 当

①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3页。

②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217页。

③ 马国川：《罗征启：大学里不能没有故事》，《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9日。

④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9页。

⑤ 《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47页。

⑥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7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2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9页。

年袁庚在蛇口那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则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特区对“中国精神”的贡献就是使人在状态上形成了一种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品格。它突出反映为思想上的解放和科技上的创新。

第四，验证了一个“大理论”。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 1992 年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中国改革试验田，深圳经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① 这就透彻地点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是邓小平一个伟大的理论发明，是开启中国社会全方位转型的关键之举，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的创造性实践。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充分而光辉的实践，特区的历史步伐又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正是这种内在联系又构成了中国经济特区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4. 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

特区的成功的确折射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魅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动员与集中能力。如高交会、文博会，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其效率之高都是左右难以比拟的。但是，我们决不应该把这种转型中的过渡状态和超常规特殊项目的获得当作运行的常态和应有的特色去对待。中国经济特区 30 年辉煌成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仍然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发现与揭示。用时任领导人的话来总结：深圳是按国际规则打篮球。^②

概括起来，其基本经验有两条。

其一，从现实状态来分析，是选择、引进并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

早在 1980 年年底，当特区条例公布之后，广东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③ 而当时全国还都把搞市场经济等同于洪水猛兽，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复辟。一位著名的理论家竟这样对任仲夷讲：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全国若都这样，那还行吗？！^④ 在他们眼里，特区就是旧中国的租界，除了五星红旗还飘着外，已经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味道了。据回忆，1982

①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 376 页。

②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 375 页。

③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 228 页。

④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 22 页。

年，真可谓秋风萧瑟、寒流滚滚，深圳也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也正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广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下去。”任仲夷强调指出：小平没有说上面认为好，只说你们认为好。这就给了省委极大的信任和支持。^①

尤其在1992年之前，虽然就总体而言，从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基本面，已经踏上了不可逆转之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却同时笼罩着巨大的阴影。当“两种改革观”成了大议论，当“反和平演变”成了主基调时，改革开放出现了杂音，一些人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了悲观。然而，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这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历传奇式“三起三落”的“钢铁”巨人，他不甘心，也不允许阴影弥漫，逆流冲垮潮流。他有胆略、有智慧地去力排众议，去扭转乾坤。于是，才有了那幕激动人心的“春天的故事”。

在这里，他做出了如下两个坚定的判断。

第一，经济判断：“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第二，政治判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严厉地批判：“反对改革的人就不要反对了，去睡觉好了。”（公开发表时是：“谁反对改革开放，人民就把他打倒。”）^② 这位88岁老人的“南方谈话”是可圈可点的。可以说正是“南方谈话”的拨乱反正，力挽狂澜，才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又重新沿着正确的航线行稳致远。他在1992年6月12日审阅十四大报告第四稿时，毫不犹豫地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③ 此言一出，可谓黄钟大吕。

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价格是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我相信比起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通过竞争的市场更能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④ 而市场竞争的压力就是内生技术变迁导致创新的决定性动力。其实，市场经济说到底也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实现社会利益的基本制度。它是人类社会近300年历史智慧的结晶，是无数理论大师殚精极思的伟大成果。

对于中国来说，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就了经济特区，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

① 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24页。

② 田炳信主笔《历史不止一只耳朵（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实录1）》，广州出版社，2004，第82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7页。

④ [英] 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70页。

历史就是这样，30年前搞市场经济还是罪大恶极，而今天我们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已经得到部分国的承认。真可谓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其二，从深层动力来总结，就是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

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不完全。”^①可以说，再一次解放人，解放中国人民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深层含义。

首先，改革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个人的积极性。社会最终主体并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经典性论点就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的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应该说，经济学的基石就是价格理论，而价格理论的精髓也就是需求定律，它背后的全部奥秘就是制约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价格（即“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这就是说经济人的假设是人们具有对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收益的理性。斯密比喻：“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

这种对利益追求的前提也就是特区人因被解放所享有更大的自由。如深圳，这个外来人口几乎占总人口95%的移民城市构成了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大力引进香港以及海外资金构成了生产力最强大的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农民工进城，让农民成为特区建设大军的主体、服务大军的主体。

其次，改革又调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也是改革具有中国魅力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安排”“去执行”，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因竞争而创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成了地区竞争的总动员令。田纪云说：“中国人民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将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③可以说，区域竞争（包括省际、市际、县际）构成了中国经济特殊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的奇迹在这里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解释。被赋予了庄严的使命感再加上转变个人命运的强烈欲望，使特区政府更加充满了活力。中国经济特区一反“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传统计划经济法则，对于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0页。

②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第27页。

③ 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华出版社，2009。

股票证券，对于土地经营，对于深度资本市场，按着邓小平“坚决地试”的指令，坚定不移地开展起来。于是，才有了波澜壮阔的一系列“财产性收入”的历史突破。可以说，在当时的体制下，有一分自由，就能释放五分潜力，就能形成十分发展。

然而，创新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在良好的特区创业环境下，终于孕育出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巨人、格力等创新型企业及其背后的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已经形成为特区的中流砥柱，90%的产值属IT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特区成为国内高科技重镇，可以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阶层形成是特区自由发展的坚强基石。

对人的解放不仅在于政治，更在于经济，其根本内容就是对个人的产权的确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对人的解放基础就是科斯在1959年的论文中所表述的：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关键条件。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指出：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他又说，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①一句话，只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通过价格（所有权的交换条件）来保护财产所有、保护自由创业、保护自由竞争，从而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

值得强调的是，“以自由看待发展”，是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念：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而且也是促进发展的首要条件。在这里，发展的标准不仅主要不是以GDP指标，而是以自由的程度看待发展的水平，更主要的还是把发展过程视为拓展自由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特区比其他地区实际上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可见，以自由看待发展，以发展去拓展自由就是中国经济特区以及中国社会近30年取得巨大进步的深层奥秘所在。

我判断，正是这两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念的高度共识与圆满结合，才终于发生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5. 中国经济特区的双重新使命

从概念上讲，特区本来就是“实行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的地区”的简称，一旦这种政策取消了，特区在概念上自然就没有可能存在了。而从20多年的实践上看，

^① 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特区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当初所设定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的使命，1992年之后当全国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特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我也一直持有特区终结论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能理解，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说的“现在特区已经不‘特’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优惠的政策了，全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按地区来优惠，而是按产业来优惠”^①这句话的含义了。而所谓“特区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的地区”，或者说“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家鼓舞士气的宣传。

那么，特区还有什么新鲜使命？进入21世纪，中央要求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并宣告中国经济特区将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②这两个“全过程”就清楚地表明，特区又被赋予了双重新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早日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大城市，构筑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版图。正如胡锦涛在2009年12月视察珠海时所要求的那样：“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③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经济特区来讲，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改革的时代也并没有结束。决不能认为特区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深化改革，而只是大力发展了。更不能得出中国社会已经从“改革开放时代”，进入了“科学发展时代”这一结论。

因为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实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才能使中国社会沿着科学发展之路继续前行。“改革”与“发展”两者的关系不是前后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它们决不处在两个时代。市场经济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是科学发展的制度保证。因为只有彻底解放了人，才能形成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才能最终解放生产力。

中国社会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今后的科学发展靠的还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仍然是第一法宝。总之，要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必须首先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离开了改革开放，发展不仅不能“科学”，而且更不能“持续”。

既然还有这样的使命、责任，那么就自然还是要给予特区相应的权力。今天，特区到底还有什么“特”的权力呢？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句著名的话：“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他提

① 《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第397页。

② 《江泽民在特区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深圳特区报》2000年8月27日。

③ 《广东，改革再出发》，《南方周末》2010年2月25日。